

战争、组织与 理性化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十五辑

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复旦大学出版社

战争、组织与 理性化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十五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组织与理性化/陈明明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2
(复旦政治学评论; 15)
ISBN 978-7-309-11968-8

I. 战… II. 陈…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5925 号

战争、组织与理性化

陈明明 主编

责任编辑/宋启立

封面装帧/王小阳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262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968-8/D · 774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五辑 / 2015 年

FUD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5/2015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主 编：陈明明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或首字音序排序）

曹沛霖	复旦大学
陈 峰	香港浸会大学
国分良成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何高潮	中山大学
景跃进	清华大学
林尚立	复旦大学
牛铭实	美国杜克大学
孙关宏	复旦大学
王邦佐	复旦大学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
徐湘林	北京大学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或首字音序排序）

包刚升 陈 云 陈明明 陈周旺 郭定平 洪 涛
李 辉 林 涓 刘春荣 刘建军 邱柏生 任军锋
桑玉成 熊易寒 臧志军

目 录

军人与国家

1. 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理性化安排 孙 力 3
2. 蒋百里军事思想中的现代战争与现代组织 束 赞 25
3. 文武关系概念化的比较
..... 戴维·E·奥布赖特(David E. Albright) 郝诗楠 44
4. 政治权威的失衡与泰国军人政权的回归
..... 张佳威 郝诗楠 71

中国政治

5. 干部交流、政治动员与反腐败 曾庆捷 97
6. 中共、苏共中央委员会代际更替比较研究
..... 张 光 黄一凡 汤金旭 127
7. 法治化进程中的政治动员：动力、模式与机制
..... 谢 岳 党东升 154

8. 被动员的选民：单位类型与城市地方人大选举中的

投票行为 孙 明 李 辉 187

比较政治与经济

9. 从实证主义到理念市场：美国智库的结构转型及其

政治原因和启示 邴 菁 215

10. 印度经济改革的崎岖之路及对中国的启示

..... 郑 宇 238

中国政治史

11. 双重身份与制度化主导

——1954—1959 年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影响因素

..... 赵萍丽 265

评论

12. 人口增长、精英冲突与社会动乱

——欧亚早期现代国家的国家危机与革命 郝 娜 299

13. 建构还是生成：中国地方民主发展路径分析

——以中国政府创新奖(2001—2014)获奖案例为例

..... 汪仲启 318

军人与国家

1. 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 理性化安排^{*}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孙 力

〔内容提要〕 人类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高度发展,使武装力量的安排变得复杂和精巧。武装力量运用的理性化与经济活动的理性化的内在关联,显示了武装力量运用的逻辑必须服从经济活动的逻辑,这是军队融入现代国家的实质。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表现和原因之一是政治国家无法对武装力量进行理性化的安排,这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难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国过程中确立政治建军的原则,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与政党引领推动国家发展的政治使命和角色是一致的。以强大的政党组织体系和思想资源为依托来实现武装力量理性化,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

一、武装力量安排密切关联社会的有序发展

武装力量的运用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家诞生,武装力量是其中的主要成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在谈到古代的东方社会时,马克思说:“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

^{*} 本文为军队“2110工程”重点学科“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和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立项课题。

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①之所以说国家的诞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有序性;而武装力量就是维护有序性的基本工具。

毫无疑问,有序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或者说是其中轴。当然,这种有序性不应该是一种主观的臆断,把符合统治者或某些人愿望的秩序称为有序性是站不住脚的。有序的内核是社会发展规律,因此,获得有序性,就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就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发展。主观臆断的有序性不具有这种实质,往往不能够积极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

由此观之,有序性是同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应该体现生产方式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它也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和阶级属性。奴隶社会时代的武装力量,为奴隶社会的秩序服务,与这一时代的生产力相耦合;封建社会时代的武装力量,为封建阶级的秩序服务,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相适应。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十分有限,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十分简单,武装力量的安排和运用也比较简单。就马克思分析的东方国家的三个部门来看,武装力量只要处理好与财政和公共管理的关系,就能够建构相应的政治体系和提供相应的有序性。

然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则并非如此。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与高度分化、高度整合、高度复杂化叠加在一起,有序性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使得政治结构现代化,其中武装力量的安排变得更加复杂和精巧。

二、现代化要求新的有序性

人类进入近代以来,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一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1页。

是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精辟地描绘了这一进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力飞速发展相耦合的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政治上相应的变迁，生产力能够有如此快速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②封建国家被现代国家所取代，专制政治被民主政治所取代，贵族政治被政党政治所取代，人治被法治所取代。这样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为经济发展和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恩格斯在晚年还谈道：“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③列宁也谈道：“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④

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有序性提升的进程，是人类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文明水平大大提高的历史进程。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一方面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进行自身的变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自身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通道。与生产力的大大提升和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相一致，现代政治的建构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远比传统政治复杂和精致,形成与过去所有时代迥然不同的特色,因此,人们往往把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称为现代国家。

三、武装力量安排首先是阶级秩序问题

军队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中促发了前所未有的演进。从国家的本质来看,由于现代国家的阶级属性不同,其国家演进和军队演进的特点各有不同;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早期现代化国家及其军队的演进特点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演进特点也明显不同。认识和分析这种差异及特点,是正确认识军队的现代转型,正确认识军队与国家、军队与政党等重要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①。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②。通过强力机关来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习俗和舆论来加以维持,是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与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区分。军队是国家强力的典型体现,所以,列宁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③考察军队的发展,考察其性质和特征的演进,必须将其置于国家的历史属性中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国家的论述最为深刻的是揭示了现代国家的阶级属性,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④。很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114页。

③ 同上书,第11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页。

然,笼统地论述现代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区分现代国家的阶级属性。

阶级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不能够仅仅将之看成是政治的概念或意识形态的概念,它是同特定的经济关系、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秩序,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秩序,是适应于这一阶级主导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秩序。在西方现代国家中,如果不以资产阶级为主导,就难以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难以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以,武装力量的安排,就是要使之服从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形成相应的政治秩序。

这是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使命。一旦安排好它的政治秩序,就会大大促进其经济发展,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成功了。然而,把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推而广之,认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也应该如此——在军队和国家、政党的关系上尤其是这样——却是一个不得不纠正的误区。

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应该确立自己的有序性,确立与自己的阶级主导、与自己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秩序。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在探索 and 安排自己的政治秩序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成就,可以和应该总结出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政治发展重要的基本规律,对国家与军队、党与军队等问题作出更为科学和深刻的阐述。

四、韦伯理性化背后的阶级秩序以及生产方式的逻辑

当代学者对现代国家有诸多论述,在国家与暴力和军队关系的问题上,德国学者韦伯作了影响甚广的经典论述。他认为:国

家是特定疆域内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疆域内成功地垄断合法的暴力机器,国家因此被视为运用暴力“权利”的唯一源泉^①。这一分析,应该说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的观点在同一走向上。在此基础上,韦伯把国家同理性联系起来,认为这首先体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产生:“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且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他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②

韦伯用理性来定位现代国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一系列的理性化:“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③在军队和暴力问题上,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最突出的特点,同样也在于使它们理性化,即:“应用有形暴力的规则的理性化,在合法的法律秩序的概念中,理性化是它的最终的归属。”^④

“理性”是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韦伯不仅用它来说明现代国家,也用它来说明现代化进程。然而,“理性”的背后是什么呢?应该深入考察“理性”包蕴的社会发展逻辑,才能够进一步考察军队和暴力的理性化问题。

韦伯考察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认为诞生出理性才使人类社会走向了现代化,使现代生活鲜明地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生活,因此是现代化的本质体现。理性尤其集中地体现在现代经济生活之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即“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

①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31页。

②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7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227页。

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①。

理性对现代经济活动来说,就是必须对经济生活予以合理的筹划,去除盲目性和模糊性,清晰地展现其发展的脉络,透视其运转的规律,并力图运用规律来驾驭经济生活,以满足个人和组织的需要。对小农经济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理性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不会鲜明地凸显出来;但对市场经济来说,对不断增长的规模经济和企业组织来说,对于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交往来说,这就是必需的和极为重要的。而且现代经济越是发展,就越是凸显其重要性。

理性对现代政治生活来说,体现在现代国家的理性化建构和运行。官僚制(科层体系)是韦伯现代国家组织理性建构的典型体现。韦伯认为,人类社会服从的权威有三种类型:法理型、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现代社会的权威应当建立在法理型的基础上,理性官僚制就是法理型支配最理想的体现。据此,韦伯概括了现代官僚制运行的基本原则:(1)各部门有依据法律或行政章程等规则而来的明确的权限;(2)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3)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或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4)职务活动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5)全职而非兼职;(6)业务执行遵照一般规则,并且规则知识是可以学习的^②。

理性政治生活的追求是力图提高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效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9页。

②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4页。

率。随着现代国家管理事务越来越复杂,国家建设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韦伯在理性基础上对理想官僚制的追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学者评价了韦伯的这一贡献:“合理性意味着达到目的的手段适宜性。在官僚制的概念脉络中,这就意味着效率。”^①

归根结底,韦伯对理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追求。韦伯把影响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东西称之为“非理性”,力图通过清除“非理性”,来化解现代社会的矛盾,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军队以及武装力量运用的理性化应该体现在哪里?韦伯提出了这一很有价值的命题,却没有更加深入地分析它,尤其是没有分析**武装力量运用理性化与经济活动理性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活动的理性化应该是其他领域活动理性化的牵引,否则,人类社会就无法前进。

由此看来,现代化要求:武装力量运用的逻辑必须服从经济活动的逻辑。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逻辑、市场竞争和运作的逻辑,都应该**高于武装力量运用的逻辑**,这是一种**新的阶级秩序**,用以保证新的经济发展不被武装力量的运用而打乱和破坏。这是与传统社会的很大区别。所以,武装力量的运用受到了更多的约束和限制。如果力图随意地运用武装力量来干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毫无疑问会违背现代化的要求,或者说违背现代化的理性原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源于英王力图运用武力威逼国会增加税收,这是资产阶级难以容忍的。如果因为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可以随意干预税收、干预经济活动,那么,现代市场就无法形成,现代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持,现代化就无法正常推进。

^① 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现代化对社会发展提出了诸多要求,韦伯从理性的角度来阐述这些要求,提出的军队和暴力应该有“**理性化归属**”的命题,是同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及国家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没有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规律,但依然是一个比较能够说明历史发展进程的、有价值的分析。如果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来加以深入分析的话,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结论。它就是要说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军队要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是军队融入现代国家的实质。

五、武装力量理性安排的政治线路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考察现代社会有些什么样的发展需求使得武装力量的运用必须做相应的变革。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说,无非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方面的发展需求。

从经济基础来看,最根本的在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拓展紧密相关。资本要顺利地积累、市场要顺畅地扩展,需要有和平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大市场,而这又与武装力量的有效约束紧密相关。

首先,必须清除封建割据。封建割据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但却极大地阻碍了市场的拓展,使市场无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无法体现市场的优势,资本也无法快速积累。也就是说,封建割据与市场经济天生就是对立的,而封建割据的典型特征或基础,就是武装力量的各自享有。所以,武装力量的统一运用,使其中央集权化,扫除封建割据赖以存在的根基,是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完成的政治使命。

其次,对集中起来的武力加以约束和规范。即使是武装力量运用的权力统一到了中央,也未见得能够完全保证市场的拓展和